

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机理、 困境与路径研究

魏晓轩,蔡定昆

(云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新质生产力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的优化重组,从加快经济增长和居民增收、促进成果共享和机会公平、助力绿色发展和保护生态三个维度提高边疆地区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性、富裕性与可持续性。然而,边疆地区存在工业基础薄弱和产业结构单一、设施建设滞后和数据利用不足、财富分配不均和城乡发展失衡、科技存量偏低和创新能力较弱、人才“引育”困难和外流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灾害频发等现实困境,影响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发挥。为此,针对当前发展困境,亟须从优化产业结构、创新数字应用、调节财富分配、加强科技赋能、“引育”优质人才、维护生态安全等方面入手,持续增强新质生产力对推进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边疆地区;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D616;F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6.04.005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十五五”期间重点任务,并在“十五五”建议的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1]。这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更展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建立在消除贫穷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没有实现惠及边疆各族人民的普遍富裕,就未达成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边疆地区地域辽阔,是我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和生态屏障区,亦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边疆地区共同富裕建设进程,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满足边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边疆地区受地理区位、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加之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进一步影响边疆地区共同富裕进程。

“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自提出后便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界主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制度决定生产力”等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内涵外延^[2-4];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5-6]。此外,学者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7],并从理论逻辑、作用机制以及推

进路径等方面探讨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关联^[8-9],研究区域聚焦于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农村地区等特定区域类型^[10-12]。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同步、同时的富裕,而是富裕程度有高低、时间有先后的渐进式共同富裕,在此过程中能够持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13]。当前,学界基于“共同-富裕”“物质-精神-生态”“发展-共享-可持续”等视角分析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水平测度以及实现途径等^[7,14-15];并关注到边疆地区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地理、人文、历史等因素交叉重叠的特殊性,深入探讨了边疆地区共同富裕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兴边富民行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联系^[16-17],并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特色产业振兴、加强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推进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18-20]。

综上所述,学界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验证了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关联性,并分析了边疆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但是,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演进方向,边疆地区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研究相对欠缺。当前,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纵深关联,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XSH010);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4Y197)

作者简介:魏晓轩(1999—),男,河南汝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通信作者)蔡定昆(1976—),男,云南宣威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

的理论内涵,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和推进路径,以期为加快推进边疆地区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1 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做出的系统阐述^[21],本文将新质生产力内涵概括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而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其中:“新型劳动者”指具备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生产技能的数字时代劳动者,是新型生产活动的主导者,能够结合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实现高价值的创造;“新型劳动资料”包含全新的设施、设备、机器等实体劳动资料和数据、信息、网络等虚拟劳动资料,是新型劳动者作用于新型劳动对象的工具,能够实现新型劳动者能力延伸;“新型劳动对象”指由生产关系变革所产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是新型劳动者运用新型劳动资料开展新型生产活动的物质载体,能够拓展显著新型劳动者的生产边界。

同时,基于学界研究,本文将边疆地区共同富裕内涵概括为:边疆各族人民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个人财富、共享发展成果,是富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机协调。其中:“富裕性”指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推动经济增长和居民增收;“共享性”指将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一同纳入财富创造过程中,使个体拥有成果共享、机会公平等基本权益;“可持续性”指在不损害后续发展的基础上,按照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原则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综上分析,本文将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界定为:有机协调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增长和居民增

收、成果共享和机会公平、绿色发展和生态优先,进而实现富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统一(详见图1)。

1.1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居民增收,提高边疆地区的“富裕性”

新质生产力通过引进与培育新型劳动者、结合实体和虚拟生产资料,持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效率、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推动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共富“蛋糕”,在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推动发展成果惠及边疆各地区居民,进而提高边疆地区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富裕性”。

边疆地区经济增长层面,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质态,能够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和经济增长方式,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推动土地、资源和原材料等实体劳动资料 and 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虚拟劳动资料的深度融合,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发展模式持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的数量型扩张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质量型发展模式转变,进一步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质增长点。新质生产力为边疆地区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序提升创造必要空间,进而保障社会物质财富的可持续积累^[22]。

边疆地区居民增收层面,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下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会催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为地区居民带来全新的产品与服务,进而在现有社会基础上创造全新就业空间,引发新一轮专业化社会分工,将持续提高生产效率、拓展市场空间、创造就业岗位,使边疆地区居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专业化社会分工中,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压缩劳动供给时间来实现收入增长^[23]。同时,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培育产业新形态,吸引高素质人才集聚并打造人才高地,通过人力资本累积,与区域产业发展形成良好互动关系,进而创造边疆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带动经济增长中促进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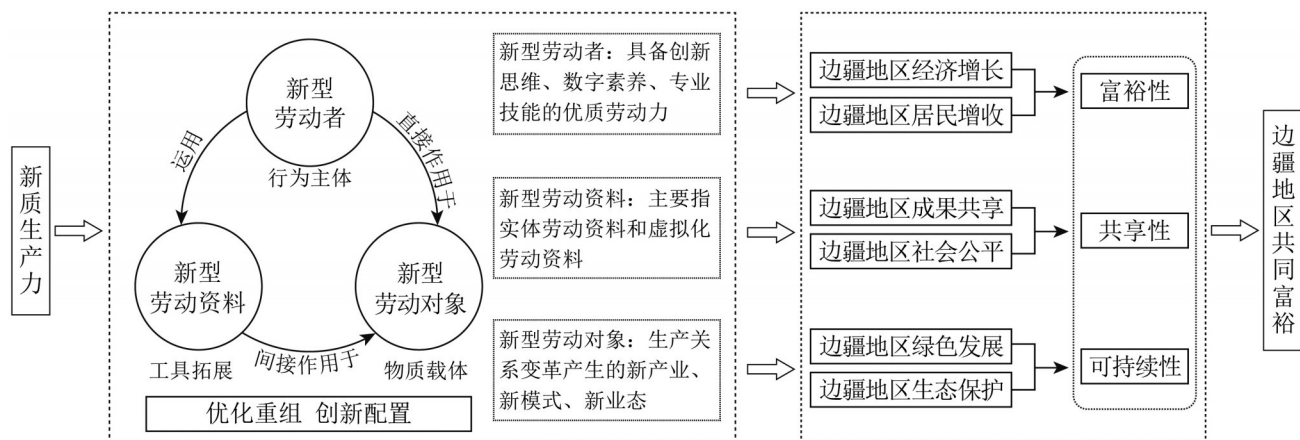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增收。

1.2 新质生产力促进成果共享和机会公平,增强边疆地区“共享性”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物质财富创造能力。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促进社会财富“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而且有助于畅通财富资源流动、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与共同富裕的“共享性”相一致。在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变革,使社会向更为稳定、公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逐步弥合区域和城乡间的“鸿沟”和“孤岛”,让边疆各族人民共享新质生产力红利,进而促进发展成果共享和社会机会公平,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中的“共享”目标实现。

边疆地区成果共享层面,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提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合效率,推动优质资源要素合理流动,改善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使经济建设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使发展成果更为公平地惠及边疆各族人民,让边疆各族人民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普遍受益。此外,新质生产力能够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要素分配模式,促进多元劳动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规避因“马太效应”和“阶层固化”而出现的富裕陷阱,增强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普适性与共享性^[24]。

边疆地区社会公平层面,新质生产力能够借助数据要素将不同的生产资料融合在一起,为区域、城乡间资源要素的合理公平流动创造新机遇^[25],也为推动边疆地区“共享性”发展提供新动能。边疆地区属于国土空间的边缘地带,由于区位、经济、生态等因素制约,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大量优质资源流向城市群、工业区、经济带等发达地区,导致边疆地区处于社会公平相对缺失的状态^[26]。新质生产力凭借数字化、智能化特征,能够打破要素流通壁垒,推动实体资源的虚拟化集聚,以强渗透力和穿透力畅通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流通渠道,为边疆地区生产主体提供先进生产要素支持和拓展全新发展空间。同时,新质生产力赋能,能够创新产业业态、转变发展模式,拓展更为广泛的劳动空间和提供相对公平的劳动机会,进而增强边疆地区社会公平与稳定。

1.3 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优先,提高边疆地区“可持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1]。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迁的先进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持续优化边疆地区经济结构,统筹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同时,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绿色发展理念,能够平衡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关系,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并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3],推进“经济-生态”和谐共生,不

断提升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

边疆地区绿色发展层面,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备绿色生产力的属性。新质生产力强调绿色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在传统生产要素基础上开发清洁能源、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加快技术装备改进等方式逐步破解边疆地区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传统工业化老路,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转型,在变革生产方式和调整产业布局中,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引领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27];同时,新质生产力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可持续性等特点,能够为绿色可持续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绿色发展成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新引擎,从而缓释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促进边疆地区财富可持续积累。

边疆地区生态保护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反映了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愿望,也体现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价值诉求^[28]。新质生产力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动态调整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最大程度将理论生态价值转化为实际经济价值,走出一条环境友好、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的共富之路,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新质生产力通过生产要素优化重组、生产关系数字化重构,从多维度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提高资源整合效率并降低传统产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维持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承载压力间的动态平衡,在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中为边疆地区居民创造优质生存环境。

2 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对于提高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富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具有独特优势,但受经济、社会、生态等因素制约,边疆地区存在工业基础薄弱和产业结构单一、设施建设滞后和数据利用不足、财富分配不均和城乡发展失衡、科技存量偏低和创新能力较弱、人才“引育”困难和外流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灾害频发等现实困境,使得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发挥相对受限。

2.1 边疆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和产业结构单一

新质生产力是在做大经济总量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9]。但是,边疆地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和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相对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一是边疆地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边疆地区的国土面积达到587.6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为61.22%;但2023年边疆地区铁路和公路里程

分别为5.98万公里和165.3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和公路里程的比重分别为37.66%和30.41%,交通设施建设与区域面积严重失衡,导致边疆地区资源要素流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存在,从而阻碍边疆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使边疆地区难以通过新质生产力催生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弱化了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财富积累。二是边疆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受历史、自然和地理等因素影响,边疆地区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以及结构相对单一(以矿产业、传统制造业和农牧业为主),导致创新要素集聚性不强,难以形成吸引创新投资和创新产业发展的地区粘性,导致传统优势产业转型进程较为缓慢;加之边疆地区承接东部沿海转移产业大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为主,且存在转移落地产业同质化、核心部门本地化进程缓慢等问题,使边疆地区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缺乏多元产业经济支撑。

2.2 边疆地区设施建设滞后和数据利用不足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拓展新质生产力应用边界,重构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态^[30]。但边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数据要素利用不足的现实,未能充分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落地转化。一是边疆地区数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边疆地区在“宽带边疆”战略推进下,持续扩大了移动互联网覆盖面积,但与发达地区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对新质生产力在边疆地区产业发展与普及中的支撑作用较弱。《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边疆地区农村互联网宽带总接入用户为3 238.9万户,仅占全国农村接入用户的16.88%,其中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普及率仅为27.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23%;2023年边疆省份中西藏、吉林、甘肃移动电话基站数量分别为6.3万个、16.3万个和22.4万个,同期江苏、浙江、广东的数量则为78.1万个、73.2万个和102.4万个;2023年边疆地区的光缆线路总长度为1 471万公里,仅占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6 432万公里)的22.87%,其中西藏、新疆的光缆线路密度仅为0.30公里/平方公里、0.99公里/平方公里,而同期浙江、江苏的光缆线路密度高达43.43公里/平方公里、42.06公里/平方公里。二是边疆地区数据利用不足。边疆地区在数字设施建设和互联网覆盖面积不足的背景下,导致数据要素在边疆地区流动不畅而产生“数据孤岛”和“数据垄断”等现象,以及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信息技术不均衡扩散而产生的“技术壁垒”和“数字鸿沟”,制约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实体产业的“乘数效应”发挥,同时也限制了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使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缺乏新动能。

2.3 边疆地区财富分配不均和城乡发展失衡

基于要素流动和空间集聚理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区对创新资源具有高度吸引力,通过集聚创新资源构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产生与发展。在此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在所有地区、群体间实现均等共享,区域和城乡之间依然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31]。一是区域间财富分配不均。《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12—2023年间边疆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 445元增长至30 721元,年均增长率高达7.80%,但边疆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占全国平均水平的82.78%下降为78.33%。2023年内蒙古和辽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8 130元和37 992元,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39 218元)接近,而其余边疆省份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甘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 011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63.77%。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布局在地理层面存在“东重西轻”现象,也成为造成区域发展不充分和边疆地区共同富裕进程较缓慢的重要因素。二是边疆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失衡。《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边疆地区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2 859元和18 66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1 821元和21 691元;《云南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云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高达2.6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9:1。表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且城乡间呈现二元分化格局,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也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在城乡间的扩散,成为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阻力。

2.4 边疆地区科技存量偏低和创新能力较弱

科技创新是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关系到边疆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当前,边疆地区以科技资本积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培育创新动能相对较弱。一是边疆地区科技存量不足。以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为例,依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4》,2024年全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78.43,广东、江苏得分为86.05、84.69,而新疆、西藏得分仅为39.03、33.90,东西部科技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来看,《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3年边疆省份经费投入总额为2 197.7亿元,而江苏省的投入经费高达4 212.3亿元,将近是边疆地区的两倍;此外,江苏、广东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3.29%、3.54%,而新疆、西藏的投入强度仅为0.60%、0.30%,区域间存在巨大差距。二是边疆地区创新能力较弱。科技创新往往带来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变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边疆地区科研经费投入不足导致科技资本存量较小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新技术研发和新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加之边疆地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缺乏承接高技术含量的转移产业的客观条件,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导致边疆地区难以催生先进生产力质态。

同时,边疆地区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较弱而引发的“阿喀琉斯之踵”效应,成为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32],也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规模化积累。

2.5 边疆地区人才“引育”困难和外流严重

优质人才是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关键动力,培养边疆本土人才和引导人才资本向边疆空间场域流动,能够加快边疆共同富裕进程。在具体实践中,边疆地区人才培养、引进相对困难,但人才流失却较为严重^[16],导致优质人才驱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作用相对较弱。一是边疆地区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边疆地区受地理区位、经济社会发展、制度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创新创业环境相对落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边疆地区对优质人才的吸引力,《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4》数据显示,2024年边疆地区的创新能力排名大多处于全国末端,其中甘肃、西藏的创新能力仅为 19.98、15.58,同期广东、江苏的创新能力高达 58.64、55.53。数据表明,边疆地区的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优质人才的吸引力。同时,据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边疆地区共有普通、职业高等学校 606 所,仅占全国总量的 21.47%,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的普通、职业高等学校数量高达 595 所。表明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边疆地区优质人才在地化培育存在困境。二是边疆地区优质人才外流严重。《中国统计年鉴 2024》数据显示,2023年边疆地区平均每万劳动力中 R&D 人员数为 16.84 人,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65.06 人,江苏、浙江更是高达 149.02 人、166.04 人。东部发达省份凭借发达的经济和科研水平对边疆优质人才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使边疆优质人才呈现外流趋势,加剧边疆地区优质人才的留存难度。

2.6 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灾害频发

边疆地区在自然资源储备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中具有天然优势,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在“两屏三带”的国家生态安全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优质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为新质生产力发挥绿色效应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边疆地区大部分区域生态环境脆弱,且自然灾害频发,给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带来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是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森林覆盖率作为评价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之一,2023年新疆、甘肃、西藏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4.87%、11.33%、12.14%,远低于全国 22.96% 的平均水平,表明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差。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影响的云南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的广西,水热时空分布不均,面临严重的干旱灾害,进一步加剧边疆区域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同时,边疆地区大多处于高原高寒、干旱沙漠、山区丘陵地带,且西部边

疆位于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震带交汇处,地质灾害频发,也进一步加剧了生态脆弱性。二是边疆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边疆省份在地理区位和气候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干旱、风雹、低温等灾害频发。《中国统计年鉴 2024》数据显示,2023年边疆 9 省份因旱灾、风雹灾害、低温冻害和雪灾导致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全国该类型总受灾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68.49%、62.20%、48.38%。综合数据来看,边疆地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面临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约束,使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效能发挥受限。

3 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推进路径

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优化产业结构、创新数字应用、调节财富分配、加强科技赋能、“引育”优质人才、维护生态安全等方面入手,使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更为公平地惠及边疆地区全体人民,推动边疆地区共同富裕取得新进展。

3.1 优化产业结构,夯实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以“新要素”优化边疆地区产业结构,降低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依赖,持续扩大边疆经济总量和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进而夯实推进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一是,畅通资源要素流通渠道,优化边疆地区产业结构。边疆地区政府要强化交通网络建设,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有序推进跨境铁路和公路网建设、细化县域交通网络布局,从而打通交通网络“最后一公里”,提高传统生产要素流通效率并畅通新型生产资源要素流通渠道;同时,依托地区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有序引进东部地区强关联性产业,持续壮大本土优势产业规模并优化地区产业布局;此外,跟进制定优势产业扶持清单,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技术支持等政策吸引社会和市场资本流入,加快形成边疆优势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供需匹配效应,以此为推进边疆地区共同富裕厚积物质财富。二是,培育边疆特色新兴产业,补齐现代产业发展短板。边疆地区政府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并出台具体措施支持现代农牧、医疗医药、文化旅游、便民服务等特色产业引入数字技术,催生边疆地区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助力打造边疆地区产业发展“新赛道”,持续拓展当地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就业空间和致富渠道。

3.2 创新数字应用,丰富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生产资料

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本质是边疆各族人民充分共享数字时代红利,避免由“数字鸿沟”而导致边疆偏远地区、贫弱居民成为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边缘者”。一是,加快推进边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边疆地区

政府要依托“数字中国”“宽带边疆”战略,持续推进 5G 网络、千兆网、IPv6 等新型智能设施建设部署,加强对地理区位闭塞、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滞后等边疆偏远地区投入力度,持续拓展数字网络覆盖面积,破解数字网络覆盖“边缘塌陷”的难题^[33];同时,探索实施边疆定向财政补贴政策,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公益基金等形式,降低智能终端设备的购置成本和数据使用资费,并联合企业利用“消费补贴”“数字消费券”等形式加强边疆居民对数字终端的消费,打通数字服务向边疆偏远和农村地带延伸覆盖的“最后一公里”。二是,在完善数字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畅通数据要素渠道。边疆地区政府要结合少数民族分布特点和社会生活习惯,在数字化应用推广中探索建立“政策支持、社会合作、公众参与”的多元推广渠道,提高少数民族语言(藏语、维吾尔语、蒙语)的数字适配度,增强数字资源对不同语言文化的兼容性,打破数据要素在多民族间流通与共享的“语言壁垒”,使边疆各族人民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有能力、有机会运用虚拟生产资料和实体资源要素创造经济价值,以此突破传统生产要素约束,逐步提升个人劳动效率和财富创造能力,加快边疆地区共同富裕进程。

3.3 调节财富分配,提升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共享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34]。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在推动资源要素流动集聚的过程中激发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优势,通过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逐步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35]。一是,健全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多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围绕工信部发布的《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边疆地区政府要加快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信贷融资、项目咨询和业务对接等服务,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对口支援机制等平台,推进东西部产业园、科技园、加工园等项目建设,从而吸引发达地区科技、人才、智力等优质资源流向边疆地区,引导新型生产要素有序参与到边疆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在优化资源配置、畅通要素流动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共同富裕进程。二是,基于数字技术弥合边疆地区城乡发展差距。边疆地区政府要借助数字信息技术探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数字平台,推动城乡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与合理配置,拓展边疆地区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共享发展红利的渠道,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同时,数字技术下沉乡村将催生农村电商、智慧物流、数字农业等新业态发展,促使农业农村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实现农业农村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进而拓展农牧民收入渠道,使边疆地区共同富裕以更广泛的形式实现。

3.4 加强科技赋能,提高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创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等实现了现代化再

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6]。”人民性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在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地区共同富裕进程中,要持续加强科技创新,为推进边疆地区共同富裕进程提供创新动能。一是,深入实施“科技兴边”行动。边疆地区政府要主导建立科技创新风险补偿基金,为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参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落地推广提供贷款、担保、补贴等风险防范措施,引导优质资本参与科技项目;同时,立足边疆特色因地制宜打造科技应用宣传场景,提高边疆各族人民对嵌入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型生产关系的认知与接纳,使他们能够将数字科技应用于日常生产生活中,切实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增加收入致富的新动能。二是,深入实施“数字边疆”工程。加快建设边疆地区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着力增强省(区)级、地市(州)级数据中心算力承载力,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中,引导东部地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推理、机器学习、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业务向边疆地区转移,以此增强边疆地区科技存量和创新动能,夯实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的算力基础;此外,基于数据资源向各行各业的渗透,引导企事业单位结合优势资源探索智慧牧场、智能矿山、数字文旅等新产业;发展网络经济、平台经济、低空经济等新经济形态,让边疆各族人民从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获益,提高共同富裕的共享性。

3.5 引育优质人才,壮大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

人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第一资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边疆地区要以破解人才“引、育、留”困境为导向,多措并举培养和引进优质人才为核心,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一是,完善边疆人才激励机制。边疆地区政府要制定涵盖福利待遇、职位晋升、安家落户、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差异化政策措施,以物质激励吸引优质人才参与边疆工作;同时,借助影片、报纸、新媒体等新闻媒介,开展新时代边疆“胡杨精神”“蒙古马精神”“北大荒精神”等宣传活动,增强人才在边疆工作生活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使人才真正愿意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建设边疆,为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共同富裕贡献力量。二是,以数字化弥合教育差异。边疆地区政府要立足当地教育资源,运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中国大学 MOOC(慕课)”等云平台,开展数字教育等实践,以数字化平衡教育资源分布,加强地方人才培养;同时,深化政校企合作机制,深化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合作,通过定向委培计划、产学研项目合作等方式,提高本土劳动者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适配性。此外,边疆地方高校要主动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定期举办经济论坛、文化论坛、发展论坛等学术活动,增进不同区域间人才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高创新知识溢出扩散效应和信息互动频率,进而以“智”增“质”,以人才“智量”和“质量”加快推进新质

生产力发展和边疆共同富裕进程。

3.6 维护生态安全,推动边疆地区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确定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加快经济绿色转型,超脱西方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37]。一是,完善区域性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边疆地区政府要结合地方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文明建设,将“两山”理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导向,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顺应经济社会由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需要,科学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交易生态产品等方式,调动生态价值利益相关者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进而维护边疆地区生态平衡,将优质生态资源纳入产业发展的物质资料中,促进生态资源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进程,使生态资源转化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生态财富和经济财富。二是,探索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实现路径。边疆地区政府要在筑牢边疆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将经济社会发展置于生态环境约束之下,探索在地化生态空间正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共同富裕模式;同时,依托资源禀赋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以自然生态为载体延伸生态产品和服务价值链,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发展“新能源开发、绿色制造、林草碳汇”等绿色新业态,将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易价值,加快绿色财富的创造与积累。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5-10-29(1).
- [2] 吴越.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 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J]. 天津社会科学, 2024(5): 103-113.
- [3] 许恒兵. 新质生产力: 科学内涵、战略考量与理论贡献[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3): 1-9.
- [4] 肖磊. 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社会性质与发展形式: 系统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形态思想[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5, 16(2): 188-210.
- [5] 徐龙建, 王浩源.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5(1): 36-44.
- [6] 孙丽伟, 郭俊华.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9): 5-11.
- [7] 燕连福, 牛刚刚.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 10(2): 82-90.
- [8] 谢花林, 陈彬, 刘薇.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 基本逻辑、作用机理与关键路径[J]. 当代财经, 2024(12): 3-15.
- [9] 杨振家, 彭正德.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问题检视与实践路径[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6): 3-13.
- [10] 韦文华. 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J]. 中州学刊, 2025(2): 39-47.
- [11] 洪霞芳, 张小华, 刘静. 新质生产力助力革命老区红色旅游价值提升的路径研究[J]. 企业经济, 2024, 43(11): 90-96.
- [12] 李明圆. 新质生产力、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7): 1-6.
- [13] 郁建兴, 任杰.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 政治学研究, 2021(3): 13-25, 159-160.
- [14] 贾茗琛. 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意涵[J]. 东岳论丛, 2025, 46(10): 182-190.
- [15] 秦艳, 蒋海勇. 共同富裕指数测算、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子识别[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3): 5-10.
- [16] 杨玉文, 陈子科. 边疆地区共同富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云南社会科学, 2024(6): 93-104.
- [17] 叶琦, 马国胜. 乡村振兴战略与兴边富民行动统筹衔接的实现路径[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5(2): 66-78.
- [18] 马志超. 共同富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理论阐述与实践路径[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5(1): 130-141.
- [19] 郭景福, 苏志龙. 共同富裕视域下边疆地区特色产业富民路径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3): 69-75.
- [20] 李奕然, 徐子懿. 边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赋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的价值逻辑与行动路径[J]. 民族教育研究, 2025, 36(2): 132-141.
- [2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奋斗, 2024(11): 4-8.
- [22] 卫霞. 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哲学阐释[J]. 东岳论丛, 2025, 46(3): 166-174.
- [23] 张香杰, 聂立清. 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分工结构调整的发展路径[J]. 江苏社会科学, 2025(1): 136-145.
- [24] 杨丹, 汪洋. 新质生产力赋能西藏共同富裕: 内在逻辑、关键支撑与实践着力点[J]. 西藏研究, 2024(5): 118-131, 159.
- [25] 姚树洁, 张小倩.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1): 112-128.
- [26] 丁忠毅, 杨胜鹏. 边疆地区收缩型城市治理: 实践动因、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4): 121-133, 234-235.
- [27] 钱智勇, 仲晓欢. 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与生态贡献[J]. 理论探讨, 2025(3): 112-120.
- [28] 李严, 杨玉文. 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绿色金融支持边疆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3): 101-109.
- [29] 肖斌, 陈其源. 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 世界观和方法论视角[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4(4): 98-105, 158.
- [30] 焦勇, 齐梅霞.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4, 40(3): 17-30.
- [31] 李梅. 共同富裕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逻辑观照与实践路径[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2): 148-155.
- [32] 俞佳奇, 沈佩翔. 科技自立自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内涵及其实践进路[J]. 科学管理研究, 2024, 42(4): 23-33.
- [33] 杨玉文. 数智化转型驱动边疆地区治理现代化: 价值意涵、实然样态与行动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2(6): 121-130.
- [3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16.
- [35] 贾若祥, 王继源, 窦红涛.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J]. 改革, 2024(3): 38-47.
- [3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40.
- [37] 周文, 李吉良.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2): 114-124.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Dilemmas and Path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Border Areas

WEI Xiaoxuan, CAI Dingkun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border areas.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new types of workers, new types of means of labor, and new types of objects of labor, enhances the commonality, prosper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border areas from three dimensions: acceler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ncreasing residents' income, promoting the sharing of achievements and fair opportunities, and facilitat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 border areas are confronted with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edicaments, including a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a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lagging facility construction and insufficient data utilization, uneven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imbalance in urban-rural development, low technological stock and weak innovation capacity, difficulties in attracting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severe outflow,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which affect the exertion of the enabling effe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this end,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edicament, it is urgent to start from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novating digital applications, regulating wealth distribution,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ttracting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maintaining ecological security, so a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enabling effe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border area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order are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